



1938年初与丁玲、萧红、田间、
端木蕻良、塞克在西安



1938年与黄源、彭柏山在新四军军部



1949年与周而复、张洪道在香港

关于纪念鲁迅先生百岁诞辰

阿
双
甘
号

有人约我写纪念鲁迅先生百年诞辰的文章时，是去年底
（1956年）我住在医院里。那时《人民日报》第2版发表了一
篇祖慰同志作的《“父老兄弟”的“报告文
字”》，说湖北省天门县（我的故乡的邻县）县委下书
记团搞成一个冤案，死了几个人，多少人受刑挨整。这
都不稀奇，稀奇的是作报告从原因上“为天门县
的人就是任何人怎样的混蛋，那就错了。我想：
这真好，我正在检讨自己只是混蛋或混蛋中的一
员，要劳动就劳动，要圈班房圈班房，什么话
也没有说，当然，要平反就平反，要改正就
改正，更没说什么话，更未说什么话。现在故乡邻县的
人民却都不是混蛋，多么使人兴奋呵！偶连往下看，
看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既谁知道完，大失所望，
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其实跟我一样，什么也未说未做。
但是丁书记，却因为这冤案而升为地委副书记了。
一时气愤，就联系纪念鲁迅先生事写了一篇《从
《狂人日记》说到天门县的人民》，以作纪念鲁迅
之用。这书也不难明白，从《狂人日记》起就毫
不费要说到吃人即说到天门县的冤案也是吃人。这可
不得了，有一种奇怪的逻辑，反对一个人的一件事就
是反对那个人的一切事，如果那个人是党员，就更是为

《关于鲁迅先生百岁诞辰》手稿之一页

杂 文(下)

战斗与悲悯

一、恶鬼的眼泪

“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

以上是若干年前鲁迅先生在帝国主义要进攻苏联的时候，所讲的话（《我们不再受骗了》）。现在的情形稍微有点不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这里必须说，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不但仍旧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并且还加上一点新东西，来说中国怎么不好了。因为现在世界上的新国家，和过去一切国家不同，尤其和帝国主义国家敌对的新国家，不仅一个苏联，并且有了新中国。

比如美帝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说：“共党虽编组民众，极力压迫言论出版自由，但共产主义将不能在华成功，盖在根本上已伤害马克思理想之力量。”好像他倒在关心中国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关心马克思理想的力量，希望共产主义在中国成功似的。这真是恶鬼的眼泪！另一美帝通讯社记者解释“一

面倒”说：“此种措施无容讳言的，给予组成人口之大部分中国人民的自由以高度之限制与对民主人民之自由思想以严重之打击。”又像他真关心中国人民的自由，怕民主人民的自由思想受了打击似的。这真是恶鬼的眼泪！

恶鬼的伎俩，是故意把共产主义和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混为一谈，以表现他的论断的不错。当然，以中国而论，不通过新民主主义，不通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能成功的。但是谁又说过可以成功呢？其次是故意把压迫言论出版自由和共产主义连结一气，看，虽然“极力压迫言论出版自由，但共产主义将不能在华成功”，好像极力压迫言论出版自由是共产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再其次是故意把人民和国民混为一谈。人民，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专政者；国民，仅有中国国籍（有的有没有中国国籍也是问题，比如这位记者，据说也是中国人，恐怕只有一个中国姓名），在工、农、小资产、民族资产四大阶级之外的被人民所专政者。界限本极明确，但记者先生必须把它混淆，这才能立论。否则读者会一眼看穿他们所关心的言论出版自由和自由思想的自由，不过是四大家族，封建地主，官僚买办，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奴才们的自由了。

照那些记者先生们的意见，中国应该怎样才好呢？无须检讨全部报道，只就上面引的那几句话看来，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必要的：所谓“民主人民”，四大家族，封建地主，官僚买办，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和它的奴才们的思想自由或言论出版自由！这些高贵的“民主人民”的神圣的自由，在不久以前的中国大陆上是有的。明白了么，记者先生的意思，就是要今天的新中国回复到昨天的旧中国去。而且就整个说，今天的中国，

也还有地方，那些高贵的人们有那种神圣的自由，比如台湾。明白了么，记者先生们的意思，是要整个中国都变成台湾！至于在过去的中国或今天的台湾，更多的非“民主人民”的不自由，那值不得记者先生们挂怀！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究竟不是昨天的中国了；今天的台湾，不但不能反攻大陆，恐怕变得和大陆一样，也只是旦暮间的事了。为了高贵的人们的神圣的自由，怎么办呢？曰，有法子：请我们的老板——美帝——援助台湾，反攻大陆，或占领台湾，直接进攻大陆！记者先生们的真实的意思在这里！恶鬼之所以谓之恶鬼，就在于它的泪花里掩藏得有恶：在于它的眼泪本身就是恶！

还是鲁迅先生的话：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痼疾是它们的宝贝（按：反过来说，我们的宝贝，它们当然看作痼疾）……它们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终于只得动手去打了……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

这些话，虽是若干年前为帝国主义要进攻苏联而发，在今天的我们的场合，也没有一句话用不着，只用在“苏联”底下加一个“和中国”字样，就更恰切了。

二、论铁幕

尽管反动阵营里没有一个人有思想，却不能说他们都没有

天才，比如发明“铁幕”这一用语的人，那天才就极为可佩。

“铁幕”这名词，是美国帝国主义下面的政治痞棍或文化痞棍们对于苏联的一种诬蔑，恶谥。无非说，苏联那种国家里面的情形，不容易知道，不可能知道。这不容易知道乃至不可能知道，当然不是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人民生活的改善，达到了出乎别的国家的人们的想像和理解之外的境地；刚刚相反，是暗示苏联国内一塌糊涂，人民痛苦已极，政府又成天在阴谋危害本国和外国的人群。不过由于统制和防范的严密，个中消息，外人不容易探索得到，所以谓之“铁幕”。除了这种暗示之外，还有另一种作用：既然苏联在铁幕之中，既然那里面的情形不容易乃至不可能知道，那么，我们所报导的关于苏联的什么，如果发现里面竟有真实的成分，那是我们的神通；如果没有，你不能见怪，原本有言在先，不过是铁幕之外的捕风捉影，属于“信不信由你”之类的呀。这样一来，对苏联捏造无论怎样荒谬的谣言，也都谁也不能谴责了。你说这名词发明得妙不妙？

但我们认为最足以表现发明家的天才的地方却不在这里；也不在他们无意之中坦白了自己关于苏联的报道全部是胡说八道；而在于他们竟一语破的地道出了事象的真实——他们和苏联之间，真正地隔着一道无法透过的铁幕。十月革命也好，军事共产也好，新经济政策也好，几个五年计划也好，反法西斯战争以及现在的和平政策也好，决没有什么神秘，也没有任何必须隐讳之处，谁愿意知道就能知道，谁愿意理解也就会理解。只有一个条件，要他不是帝国主义者，不是帝国主义下面的政治痞棍和文化痞棍。苏联尽管通体透明，谁都可以一望而

知，对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下面的各种各样的痞棍，则永远是谜，永远是康德哲学里面的“物本身”。打一个浅近的比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联共党史，这些书尽管都印刷得清清楚楚，只要努力，谁都可以理解。但在帝国主义的痞棍们看来，却永远是无字天书，不是语言隔绝，不是不识字，不是没有学文法，而是他们有不能看，尤其是不能理解的苦衷：一理解，他们自己就没有了。那些书和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痞棍们是有你无我，势不两立的。苏联和他们正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和苏联之间，和一切进步的人群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通过的、不可撤除的、不可逾越的铁幕。而他们竟一眼看出，一口道破了，所以说是天才！

现在，美国痞棍的徒子徒孙们，白华的小喽啰们，又在用铁幕这字样说今天的新中国了。他们在香港这地方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无耻的小报，对新中国造出各种各样的荒谬的谣言，名之曰“铁幕新闻”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不是说第一个将花比美人的是天才，第二个就是笨伯么？这些白色的老狗们，怎一点点新把戏都玩不出来呢？但真实倒也真实的，中国的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诞生了，这件事尽管毫不神秘，毫无隐讳，对于白华和白华的喽啰们，却隔着一道深厚广阔的铁幕。

鲁迅先生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譬如有人关在铁屋子里……”现在不同，现在是有人隔在“铁幕”的外面。一个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让他在门外哭泣吧，我们的友谊之门，不为叛逆者而开。”（曾卓《三门》）这里也可以说：让他们在幕外狂吠吧，让他们作垂死的哀鸣吧，新中国的“铁幕”不为这些白华和他们的喽啰们而开！

三、该死的张国兴

该死的美帝通讯社记者张国兴利令智昏，痰迷心窍，丧心病狂，迎合美国帝国主义的意旨，投合中国反动派和落后分子的心理，一连串发表了许多所谓“报道”，以自己的无知的见解、反动的见解、奴化思想的见解，曲解新中国的大政方针；照自己的形象和心理，照反动派、落后分子的形象和心理描画新中国的人民，尤其是工人和农民；诬蔑新中国的人民，尤其是工人和农民！以“外国人的仆役”代表新中国的工人，说新中国的工人相信“英国人美国人还会来的，我们将来还要伺候他们的”；说农民是不肯学习的懒虫，因为过重的负担而对党政当局不满；甚至认勾结匪特、阴谋叛变的分子为新中国的工农！这是什么报道，这是颠倒是非，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血口喷人的狂吠！谁需要这种报道？谁欣赏这种报道？谁相信这种报道？谁会看见这种报道了而感觉得安慰、喜悦，惟恐其不真实，不穷形尽相？谁会被这种报道所蒙蔽、迷惑？岂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吗？岂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吗？岂不是原是地主官僚买办之类，现在离开祖国、无处安身的白华吗？岂不是被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所麻醉，不知道有祖国，更不知道什么是祖国的新生的一部分所谓侨胞吗？岂不是无知识，无理解，不明是非的全世界的落后分子么？张国兴的报道，为谁服务，服的什么务，只要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中国的革命的进程是先有乡村后有城市的，解放军之所以能胜利，也因为先有了广大的乡村。这中间没有农民的参加，

没有农民的愿望，没有农民对中共及其领导者的由衷的信任，农民没有从革命逐步得到真实意味的解放，中国革命是不可想像的，革命的胜利是不可理解的。现在中共有几百万党员，其中大多数是农民；解放军有几百万战士，大多数还是农民，此外参加工作，参加农民组织的更远超过此数。农民，正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或者他们的父母儿女兄弟姊妹夫妇朋友就是共产党或解放军或两者兼是，他们对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爱戴、拥护、依靠、尊崇的热忱是无穷的！他们把共产党和解放军当作家人亲眷一样，当作天地父母一样，当作恩人救主一样。而共产党也真使他们获得了土地，改善了生活，提高了政治地位，获得或改造了思想，从奴隶变为主人，从旧人变为新人，从无知变为有知，从被剥削被压迫者变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大支柱。这是怎样的一件惊天动地，旋乾转坤，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大事啊！张国兴看见了没有？听见说过没有？知道不知道？理解不理解？中国的农民有几万万；农民中间有富农、中农、贫农；各地解放的时间有先后；农民在旧世界里没有机会受到文化教育，普遍地陷入于一种无知、愚昧的况态；地主恶霸的权力影响，还未摧毁尽净；难免有少数个别落后的农民，散处在今天的政治影响之外，孤立集体生活之外，不求上进，不了解今天是一个怎样的大翻身的日子；只看见个人小我的一时利害，因之发出天真可笑的言论乃至那言论相配合的某种行动，但比之于无数觉醒的农民参加了伟大的中国解放运动，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来，只能算一件不值一谈的小事。它不过证明农民的改造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军事胜利之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就是万里长

征才跨了第一步的一个具体的说明。张国兴如果只是由于无知，以那种题材为报道，已经是见树不见林，难免明察秋毫，不见舆薪之谓；何况他还不仅如此呢！

农民的问题是这样，工人的问题也是这样，工人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有着悠久的光辉的战斗史，比如北伐前的省港大罢工和五卅运动，北伐时的武装占领上海，蒋介石叛卖革命后的广州暴动，解放战争中的护厂、护路、支前等等运动，都表示工人对于革命的贡献是伟大的。工人及其领袖，在历次斗争中慷慨牺牲的更是不少，张太雷、向忠发、施洋、顾正红、梅式钧、王孝和……列举不尽的名字，用自己的鲜血把中国革命史染得鲜艳夺目的正是他们。没有这些先烈，革命的成就，决没有今天这么伟大。中国的工人，是“外国人的仆役”？希望英国人美国人再来的那种“外国人的仆役”能代表一切洋务工人？不用说，工贼、特务，受工贼特务愚弄的落后分子，即使是今天，也未必完全绝迹了；但工贼特务根本不是工人，落后工人也不能代表整个工人阶级，更不能因为他们有对当前生活有不满处就笼统地说是工人对中共和人民政府的不满。

帝国主义当然不会忘情于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蒋介石匪帮当然不能忘情于他们对中国的统治，地主恶霸当然不会忘情于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他们互相勾结，用种种方法暗中麻醉工农，收买工农中的落后分子，图谋异动，是必然的，什么“一贯道”、“九路军”之类的组织在各地出现，也是必然的，但那不但与工农无涉，而且工农人民大众一定会用自己的力量消灭他们，张国兴不死，一定可以看见。

但张国兴的报道中也有一点是真实的，就是他说现在的中

国人中还有一种“外国人的仆役”。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不是那些洋务工人，而是整个蒋介石匪帮，整个地主恶霸官僚买办以及奴化了的知识分子，比如张国兴。这些人的确是希望、相信英国人美国人还会来，切盼、准备着他们来再伺候他们，而且只有他们再来，这些家伙才能得救。张国兴之所以发表这么多这种报道，也正因为他不但今天正在伺候美国人，而且准备他们再到中国内地，给以更大的伺候。不幸他不知道今天在中国最多最有力的是中国人民。他们自己就是中国的主人，自己能治理自己的国家，决不需要什么美国人英国人，更不需要“外国人的仆役”。代表帝国主义的英美人永远不再来了，他们的仆役更是永远倒下去了。张国兴，你“外国人的仆役”，永远外国人的奴才，你的冰山是靠不住的，它已经解消了，正在解消中，看你怎么办，看你往哪里逃！

四、战斗与悲悯

儒家的所谓悲悯和今天的革命运动、革命思想很少因缘。悲悯是圣哲们个人的高人一等的情操，自己站在高处，俯视下界的人群，愚昧无知，自私残暴，劳碌辛苦……而又无可救药。明知无可救药，偏想用自己的力量拯救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徒劳枉功，空言无补，于是只剩下一一种可贵的情操：悲悯。革命首先不是个人的事，是阶级对阶级，集体对集体的事。其次也不是自己站在高处，即站在群众之上或之旁或之外的事，无论怎样的思想家、理论家，都必须站在群众中间和群众一体。同时群众的际遇又决不是不可改变的，在革命者

看来，是可以改变，必定改变的，无论需要多久的战斗，无论战斗多么艰苦，胜利一定属于自己，因此革命者的情绪基本上是乐观的，用不着悲悯。

虽然如此，但在革命者是知识分子的场合，在他以个人的身份而战斗的场合，在革命初期，阶级觉醒不够，知识分子一面自己也未必获得了坚强的阶级意识，一面又感觉唤醒群众之不易的场合；有时也不期而然地有那种悲悯，而且还往往是对敌对的方面即战斗的对象方面，有那种悲悯。

鲁迅先生说：“苟奴隶立于其前，必哀悲而嫉视，哀悲所以哀其不幸，嫉视所以怒其不争。”在《药》那篇小说上，他写被囚的革命者向狱卒宣传，狱卒不但不接受，反而打了他几个大耳光，他不但不生气，反而叹息地说：“可怜！可怜！”里面是充溢着所谓悲悯之情的。像狱卒那样的人，恐怕已经不止是奴隶，而且是奴才了，连对于奴才、敌对方面的最下贱者，也不免有着悲悯，足见要完全没有悲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前几天，有人提到过一个美帝通讯社的华人记者的“报道”，后来还从报道者那边得到了一点反响，不用说，那反响对于新中国的态度和见解都和以前的完全一样，甚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似的说我们称斯大林大元帅为“巨人”，也无异另外的人之以美帝为主子。战斗者的最大的不幸是碰见的对手竟是一种奴才。奴才总是乖巧的，他会以战斗者加给他的语言回敬给战斗者，在他，大概以为这就是致命的一击了。

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它表示人民站起来了，他们的统治者倒下去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倒下去了！被剥削被压迫者站起来了，剥削压迫

者倒下去了！这是怎样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大事呵！在新中国诞生之前，世界上早有以巨人斯大林大元帅领导的苏联的存在，它表示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站起来了，将要一个不剩地站起来；压迫阶级倒下去了，将要一个不剩地倒下去！这是怎样一件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大事呵！这位美帝的华人记者，果真对于这样的大事，毫无所知，毫不理解吗？难道在他看来，新中国果真是和旧中国一样的乃至更坏的东西么？苏联果真是和美帝一样的乃至更坏的东西么？斯大林大元帅，再说一句，这位不折不扣的巨人，果真是和杜鲁门或希特拉一样的乃至更坏的人么？如果是，这才是世界上最大的、令人恐怖的愚昧无知——自然是在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新闻记者场合；至于他对新中国的那些诬蔑诽谤，反而只是小事！本来阶级成分是最限制人的东西，没落阶层有一个不可逃避的共同命运：无知。尽管这样，但某一阶级的个别分子是可能摆脱阶级意识的束缚的；某种阶层的个别分子也是可能变成有知的，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国不知多少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领导革命，献身革命，歌颂革命，至少并非全都出身于工农。这位记者，如果真是帝国主义者本身，国民党反动分子本身，封建地主本身，或者他们中间的重要分子，那是被注定了要灭亡的角色，没有什么可惜。可是他不是，他是个青年，是个下笔千言的知识分子，而且不过是一个被雇用者，只要处在一个较好的社会、较好的时代，受点熏陶教育，是可能成为一个有用人才的。不料竟被旧社会造成一个甘心 and 人民敌对，和新的祖国敌对，为和新的祖国敌对的帝国主义服务，用帝国主义对他的新的祖国的看法来咒骂祖国，“汉人学得胡儿语，反向城头骂汉人”，骂得那么振振有